



地方志論文選

第一集



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地方志论文选

第一集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 录

学习《邓小平文选》推进新编地方志工作·····	梁寒冰(1)
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	刘光禄(12)
关于地方志的几个问题·····	朱士嘉(29)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两年多来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 的意见·····	中国地协理事会(39)
全国省志座谈会纪要·····	(51)
城市志座谈会纪要·····	(57)
全国县志座谈会纪要·····	(62)
编纂新方志刍议·····	黄 苇(72)
关于编修城市志的几个问题·····	梁寒冰(85)
县志编修的基本方法·····	李明 杨向东 陈有清(90)
关于编写专志的若干问题·····	刘光禄(103)
编写大事记之我见·····	傅振伦(116)
修志必须认真拟订篇目·····	李 泽(120)
谈谈地方史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来新夏(131)
论 传 记·····	张祥麟(143)
谈 称 谓·····	张 友(151)

学习《邓小平文选》 推进新编地方志工作

梁 寒 冰

新编地方志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纲领，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它对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修志工作具有更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文选》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不必要再提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只要马克思主义就行了。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坚持的。现在，有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反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理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个别错误论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无论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同志，在个别论断上都不免有所失误。它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能丢掉。如果

丢掉这面旗帜，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而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很难设想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丢掉这面旗帜，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就会发生怀疑，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也会发生怀疑，势必引起党和人民的分裂，中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坚持“两个凡是”，一是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针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明确地指出：反对“两个凡是”，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开端。如果当时不批判“两个凡是”，是不可能恢复毛泽东思想体系，也不会有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小平同志指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使党在理论上，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了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一个精神支柱，使我党在国际上继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不单是从党的利害出发，而且是从民族和国家的利害出发。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继承人。

我们的修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对于我们的编史、修志工作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只有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文选》的精神实质，用以指导我们的修志工作，才能使之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才能编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型地方志。

二、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十年动乱结束后，当我们批判“两个凡是”，清除“四人帮”极左流毒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有人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人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人宣扬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有人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情况，重新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试想，当时如果不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会泛滥成灾，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在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也还遇到一些同志的抵触和异议。有的同志说，是旧话重提；有的同志说，是“四根棍子”，诸如此类。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不赞成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小平同志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诚然，中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这种落后的状况，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旧中国的历史造成的。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大大地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取得了旧中国千百年来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

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象资本主义那样是为剥削而生产的。正因为如此，我国人民才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

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做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就是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就愈发展。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不要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刑事犯罪分子，等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由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呢？由谁来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党的领导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决不能因此作为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多次错误，每次错误总是依靠党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正如列宁所说，这正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也是对人民负责的标志。现在邓小平同志正在大力倡导改善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以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坚持的是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无数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悲惨的失败；只有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于1949年获得全国的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晚年，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亲自开创的中日、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得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缺点和错误，怎能同他为人民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相比拟呢？况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同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分不开的，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因此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否定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我们的修志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在新的历史时代修志，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要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尤其要着重反映地方的特色；要以《邓小平文选》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线，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面貌。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必须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

三、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曾经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真正地实现这个转变。十年动乱后，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小平同志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决然地提出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试想，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我们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吗？邓小平同志不愧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真正继承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新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经过拨乱反正基本上清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流毒，使党的工作着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开始于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如果没有三中全会的新形势，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修志工作，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兴旺景象的。新的形势给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必须紧密配合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如果新编地方志，对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必将引起各地党政领导和人民的重视，它比任何空洞的宣传都有说服力量。在一些修志先进的地区已经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应该做一次系统的总结，使经验系统化、条理化，上升为理论性的东西。在修志过程中，有不少地方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也应做一次系统的检查和总结，使尔后的修志工作更好地为两个文明

的建设服务。

四、科学和教育事业

现代科学的发展，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方向。科学理论的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的突破，迟早会给生产技术带来巨大的进步。当代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为之一新，使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增长。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科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不认识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作了详细的科学论证，恢复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的正确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小平同志着手整顿教育工作，首先遇到的是所谓“两个估计”。如果不推翻两个错误的估计，我们的教育事业就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给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恢复了名誉，才使惨遭十年动乱破坏的教育事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二大又把发展科学和教育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充分说明科学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我们的新编地方志，要充分反映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尤其要反映各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地方志要详细记录地方的自然面貌、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社会生产所起的重大作用。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结构的变化，教育体制的改

革，新旧学制的演变，科学和教育的普及，扫除文盲的情况，不论省志、市志和县志均应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科学和教育是经济建设的智力基础。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地，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它所指的是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而培养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又红又专的劳动者，除生产实践外主要是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智力投资的多寡，往往决定生产技术的水平。地方志对于科学和教育的智力投资，也应记载它的历史演变情况。在修志过程中，要培养一支有文化科学知识、方志专业知识和编写工作能力的又红又专的队伍，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专家。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他把两个文明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和战略方针，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保证之一，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它的目的是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纪律的人民。

地方志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很密切，且不说它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如果我们能给地方提供翔实的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科学资料，仅此一项对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就会发生一定的作用。地方志不仅要反映建国以来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建设，尤其要反映共产主义思想的建设。

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发扬共产主义的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同样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的宝贵生命。他们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品德。“大公无私”，“无私无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地方志不论记事和记人，都要充分地反映他们的英雄业绩，记载他们的革命情操和道德品质。

地方志中的人物志，是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选择哪些人物入志，哪些人的事迹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历史人物的选择，要注意是否做过有益于乡里的公益事业；凡是进步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艺家，或者是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者均可入传。新编地方志不应为封建帝王立传，也不应为新旧军阀和土豪劣绅立传。人物立传的主体或者说主要人物，应该是革命先烈、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先进生产者 and 先进工作者，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头

人。

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个论断提出后，也有一些同志怀疑，既然阶级已被消灭，怎么还有阶级斗争呢？《文选》作了比较详细的回答。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段时期内，阶级斗争还不可能消灭，我们还处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中，国外的敌对阶级必然要采取各种方法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剥削制度的历史遗留，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不但会同国外的敌对势力相勾结，也会和港台的反动资产阶级相勾结，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现象，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某些人的欲望。有一些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乃至采取经济犯罪的手段来满足其贪欲，以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同上述敌对势力的斗争，不能不说是一种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同于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如何处理建国后的阶级斗争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对阶级的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强调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致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根据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理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是可以得到正确处理的。

建国十七年来的重大事件，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团结一致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如何对待这一段历史，小平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在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未作出系统的总结之前，应根据小平同志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指示精神，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地方志的《大事记》中予以简要的概述，不宜详细记录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

《文选》有关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问题，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等问题，都与修志工作有密切关系。《文选》涉及的范围很广，论述的问题很多，我只就上述有关修志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介绍。总而言之，我们的修志工作，要以《文选》作指导。只有学好《文选》，才能使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1期）

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

刘 光 禄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已较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并且已有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名著《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概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历史学的系统以及史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可以说，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此后，郭沫若、范文澜同志，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的著名代表，并取得了前人难以取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

从1919至1949年的三十年中，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方志学理论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专门著作，但基本上还是就方志本身论述方志，极少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方志和方志理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李泰芬《方志学》，曾以进化论的思想，解释方志领域的某些事物；进化论的思想与封建社会的天命论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李泰芬在1935年总纂的《阳原县志》自序中说：“近半世纪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须重社会关系，民生尤贵生产样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

史潮，岂能独外”。在该志书中，记述了农村的生产工具，分析了农村的佃农，自耕农和富农、庄主等（结论上有错误之处——笔者），并记述了阳原县自民国以来的有关地价、工资等重要经济资料，这在民国时期来说，在志书中注意记述和分析农村阶级和经济问题，还是不多见的。尽管李泰芬在方志中重视了“生产样式”和社会经济，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远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志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志和方志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水平。这是历史事实。在全国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已初具规模；而马克思主义在方志学中的运用，却极为罕见。足以说明我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薄弱。

全国解放后，我们的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方志工作。五十年代后期，不少省、市、县发动与组织了编纂新方志。在编志的实践中，一些同志也曾提出和探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编志的问题。刚刚兴起的编志工作，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和不断继起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顺利进行下去，到了“文化革命”“四人帮”横行时期，就完全中断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未能深入、系统地继续进行研究。

自从1980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上倡导编纂新地方志以来，各地编志工作蓬勃发展。1982年5月，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梁寒冰同志，在一次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新编地方志书的指导思想问题，而且也关系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要把方志学建设成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方志学，必须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阐述方志领域中的一切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给予方志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笔者仅就马克思主义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以期有更多的同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编志的问题

任何时代编纂志书，都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任何时代编纂的地方志书，都是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是一般规律，是任何时代编志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所以旧的志书，都带有旧时代和剥削阶级的鲜明烙印。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编纂的志书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志书。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英勇的革命斗争，迎来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正处在两个“文明”建设的新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的历史。因此，编纂社会主义时代的志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要正确地、全面地记述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纂出“三新”的志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人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